

族群地圖與語言地圖的史實鑑定：

從小川地圖 (1907) 說起^{*}

洪惟仁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人文地理地圖中和語言分佈地圖最為相關、可以作為比較材料的是祖籍分佈地圖。如果地圖繪製都一樣的精細、準確，不同時代的祖籍分佈地圖和語言分佈地圖可以作為族群遷徙、語言轉移的歷史證據，如果其中一方有所錯誤或不足，採用為歷史材料時，其歷史價值就必須審慎評估。本文從小川尚義的「臺灣言語分布圖」(1907) 說起，討論如何鑑別族群語言地圖文獻的歷史價值及重建史實的可能。

關鍵詞：祖籍分佈地圖、語言分佈地圖、族群遷徙、語言轉移、事實重建

1. 前言

台灣歷史上出現了幾次祖籍調查，根據這些祖籍調查資料也繪製了幾張漢族分佈圖（詳參許世融 2011）；根據實際的田野調查繪製的現代台灣語種分佈地圖也已經出來了（詳參洪惟仁 2013）。比較這兩種地圖，發現空間分佈有些差距。這些差距造成的原因，歸納起來有 4 種：

- 1) 地圖繪製錯誤造成的落差：祖籍地圖和語言地圖任何一方有錯誤，即可能影響事實判斷。
- 2) 分類不同或歸類錯誤造成的落差：原資料的祖籍分類與歸類與語言地圖的語言方言分類系統不一致，比較時必須重新調整歸類。

* 本研究長期接受國科會研究補助，謹此致謝。本文初稿於 2013/1/29 在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劃與社會發展學系所舉辦的「語言與地理歷史跨領域研究工作坊」，承蒙與會學者熱烈討論，獲益良多，謹此一併致謝。

- 3) 精細度不同造成的落差。地圖繪製時歸類太粗。如原始資料仍然保存，可以根據原始資料重新繪製較精細的地圖。
- 4) 歷史演變造成的落差。地圖的史實鑑定無誤，語言調查也很精細，證明地圖的落差是反映了歷史的演變。

所謂「地圖繪製錯誤」指的是地圖繪製的原始依據與資料處理原則，不能充分反映實際分佈情形。根據情節輕重，有 3 種情形：

- 1) 沒有調查，憑空想像。
- 2) 分類不佳，歸類錯亂。
- 3) 調查不精，以偏概全。

第一項錯誤「沒有調查，憑空想像」，不言可喻，是完全不可取了。但是其他兩項卻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地圖都不可能做到完美，缺漏只有程度之差而已。

以第二項「分類不佳」而言，怎麼分類才是正確、完美，只能說「前修未密，後學轉精」。調查資料越來越齊全，分析研究不斷進步，分類就越系統化而無遺漏，分類的進步可以說是不斷嘗試錯誤的結果，不能一蹴而就。問題在於過去的地圖是根據當時的資料與觀念分類繪製的，如果調查當初已經如此分類，後人也無可奈何，只好將就接受了，如何運用就看使用者的目的以及史料的補充了；如果調查當初雖然分類不完美，但是調查資料完整保存，可以重新分類，那是再好不過了。

至於第三項，如何才算「調查不精」，什麼樣的調查才算「精細」？這要看目的決定，不能一概而論。

比如調查詞條，要調查多少條才算精細？一千條不夠嗎？四千條就夠嗎？沒有一定標準，如果只要解決一個小問題，為何要調查幾千條，幾條、甚至一條就夠了；如果要把整個語言做系統的描寫，包括語音、音韻、詞彙、語法，全部都要關照，那一萬條也不夠。任何語言紀錄都不可能窮盡，語言學家再怎麼詳細紀錄，也不可能紀錄一個語言的全部。語言學家只能根據研究目的，調查要知道的。說得極端一點，語言學家都是瞎子在摸象，只能摸象的一部分，摸不到象的全部。但是有些語言學家可以把許多瞎子摸象的報告，湊起來拼圖，拼出一個象的全圖。語言學家所能做的僅止於此。

傳統方言學調查忽略了地理變異或社會變異，調查詞項通常很多；地理方言學家或社會方言學家注重地理變異或社會變異，如果調查點多，調查人數又多，不可能同時兼顧詞項的調查量，否則調查時間就會拖得太久，甚至最後研究任務無法完成。

再如調查人數要多少才夠？這也很難說，傳統語言學家調查一個方言，都只調查一兩個點，一兩個發音人，就以為了解整個方言了。這種方法，對地理方言學家及社會方

言學家來說都缺乏代表性。因為任何方言內部一定都有地理變異和社會變異，調查一兩個點，一兩個發音人怎麼可以代表整個方言？甚至整個語言？

調查點密度和參考行政單位大小和地圖精密度相關，調查點越多，行政單位越小，調查點密度越多，當然越精密；調查點越少，調查點密度越低，錯誤機率越高。但是無論怎麼精細都有限度，精密度永遠都會不足，因此以偏概全無法避免，只能儘量減少。

如果調查全部，來個全民普查，那當然很好。不過全民普查的項目通常很少，不可能進行完全的語言普查，語言學家的語言調查沒有辦法進行全民普查，即使可能也只能選擇小地方，進行試驗性的或地區性的精密調查，不是全民普查。

台灣有史以來最細密的語言地理學調查方法莫如鄭錦全團隊所進行的「家戶調查」，「家戶調查」接近於全民普查，但從 2004 年至今也只能調查新竹縣新豐鄉、雲林縣崙背鄉、新竹新埔鄉、苗栗縣後龍鎮及南庄鄉。全國的「家戶調查」需要龐大的財力、人力、時間，只有政府才能進行，不是語言學家之所能。微觀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如果目的著眼於全台灣的宏觀研究，過渡微觀的調查緩不濟急。完成一個鄉鎮的調查需要幾年的時間，要完成整個台灣的語言分佈調查，即使發動全部的語言學研究人力，也可能需要幾十、幾百年的時間。因此本研究不採用這種方法。

台灣的行政區域劃分，語言社會、語言版圖以及語言形式變化相當迅速，我們的調查研究就好比為一隻正在快速奔跑的馬素描一樣。方言學、語言地理學的調查研究本質上具有「搶救調查」的性質，語種分佈的細節本質上不可能完全掌握，為了完成設定的研究目標，對於調查的方法和時間跨度都必須有個限定。

語言是變動不居的，如果一定空間的語言地理學調查不能在有限時間內完成，拖得太久，空間分佈和時間變化會發生混淆，共時研究會面臨歷時變化的困擾。

任何研究方法都有所見、有所蔽，有優點同時有缺點，如何取捨，端看研究需要。我們的調查是為了宏觀地了解臺灣語言分佈的實況，因此即使調查方法不夠精細，也是為了研究需要所做的選擇。

日治時代的族群、語言研究，已經發表的地圖幾乎都是根據全面普查（如小川地圖（1907，【地圖 11】）或臺灣總督府（1928）），¹或者是全境掃描調查（如移川子之藏等（1935）

¹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已出版」的資料中，唯一對臺灣漢族祖籍調查的詳細資料是 1926 年人口普查，1928 年出版的《台灣漢民族鄉貫調查報告》，報告中附錄了一張彩色「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分布圖」。現存地圖的版本有兩種，一是原圖，魏德文等《測量臺灣：日治時期繪製臺灣相關地圖》（2008: 119）及黃卓權《進出客鄉：鄉土史田野與研究》（2008: xv）所附。洪惟仁（2013）【附圖 2】所附即此；第二張是

所附 5 張台灣南島部落分佈圖及小川尚義、淺井惠倫 (1935) 附圖 (見【地圖 14】)。這些地圖因為都全面涵蓋了整個台灣，其史料價值是不言而喻的。

這些族群、民族分佈地圖雖然未必完全反映語言的事實，但是也反映了很重要的史實，並且一樣是臺灣全境宏觀的調查，因此值得進行比較。重點是這些地圖文獻所反映的史實有多少語言史的真實性，必須審慎評估、重新鑑定。如果能夠把這些地圖所反映的史實鑑定出來，就可以還原百年來台灣的語言史或族群史。

本文以小川尚義所繪製的「臺灣言語分布圖」(1907) 為例，嘗試對這張地圖進行評價，看看那些是作者的錯誤，沒有史料價值；那些是因為歸類粗糙，必需重新歸類，重新繪製地圖；那些提供的史料不足，需要參照其他的史料，比較新的調查研究，澄清、還原語言地理分佈的史實，以便重建台灣的語言分佈史或族群分佈史。

2. 小川地圖 (1907) 與實際的落差

小川尚義 (1869-1947) 《日臺大辭典》(1907) 一書中附錄了一張彩色的「臺灣言語分布圖」(以下簡稱「小川地圖 (1907)」，參見文末【地圖 11】)。因為它的題目就叫「臺灣言語分布圖」，一般認為是第一張台灣語言地圖。如果這是一張真正的語言地圖，那麼一百年後，再做一次調查，我們立即可以進行一個真實時間的比較，重建臺灣的語言分佈史。我們把它拿來和現代方言地理學和族譜地理學的研究成果比對，雖然可以認定大部分是正確的，卻發現到一些落差無法用語言地理發展史的觀點來解釋。這些落差是怎麼產生的呢？小川地圖 (1907) 反映多少史實？

2.1 祖籍、族群與語言認知的落差

2.1.1 小川地圖 (1907) 作為語言地圖的問題

小川尚義並沒有說明小川地圖 (1907) 是根據什麼資料繪製的？我們曾推測小川尚義可能採用 1905 年總督府「臨時戶口調查與國勢調查」的資料繪製 (洪惟仁 2006)，因為這份資料記錄了當時台灣居民的常用語言及副用語言，對了解廿世紀初臺灣的語言使用情形是一份寶貴的文獻。但是根據許世融 (2011) 的考證，本圖是根據 1901 年「關於本島發達之沿革調查」有關漢人祖籍人口的調查報告所繪。他的理由是：

東京新光社編《日本地理風俗大系・15・台灣篇》(1931: 170) 重繪黑白地圖，洪惟仁《台灣方言之旅》(1994) 卷末附錄即此。

- 一、分類法的不同：臨時戶口調查（1905）於台灣語言僅列出福建語、廣東語、蕃語等項目，與沿革調查（1901）所列舉的祖籍項目包括：泉州、漳州、廣東、熟蕃、汀州、潮州、福州、永春、興化、江西……等（詳下）不合，也與小川地圖（1907）福建語分漳、泉不合；
- 二、編修時間的比對：小川地圖（1907）的繪製在時程上來不及利用 1905 年的戶口調查資料。根據小川尚義的說法，全書是在 1905 年 11 月脫稿，小川隨即將稿件帶往東京準備出版，翌年 4 月開始印刷，1907 年 3 月出版。²但是臺灣首度的臨時戶口調查是從 1905 年 10 月 1 日才開始進行，小川地圖（1907）與完稿同時。資料的彙整與地圖的繪製也需要相當的時間，可以推斷小川尚義來不及參考 1905 年的調查資料。

根據以上兩個史實鑑定的證據，許世融推斷本地圖所能夠參考的資料只有臺灣總督府「關於本島發達之沿革調查」（1901）。

2.1.2 臺灣總督府「關於本島發達之沿革調查」（1901）

日本領臺之後，便開始調查台灣各個面向，包括自然的與人文的普查，臺灣各族群之普查只是其中一環。明治 33 年（1900）底，總督府民政長官發文各縣廳知事，命其進行「關於本島發達之沿革調查」，目的是為了了解「本島住民移住以來變遷的狀態及各民族集散的狀況」，³要求所在地區的縣廳首長依據別紙調查事項及樣式，進行精覈調查，並限明治 34 年（1901）3 月底完成報告。

各地方行政機構陸續將此份資料送回，除了文字報告之外，還有一份祖籍與民族調查統計資料，這是對本研究而言最寶貴的史料。不過有關族群的分類總督府未做嚴格的指定，所以各地區所調查的族群種類也不一致。以當時臺北縣（轄現在的桃園縣）而言，其調查的籍貫種類計有：泉洲（州）、漳洲（州）、廣東、熟蕃、汀洲（州）、潮洲（州）、福洲（州）、永春、興化、江西等。有些的調查沒有「潮州」，「潮州」歸入「廣東」項下，造成歸類不一致的問題。

雖然對於族群的界定不若 1926 年的鄉貫調查嚴謹，但由於其調查項目相當精細，調查單位根據清代以來的舊街庄，多數地區的行政單位甚至比 1920 年之後的大字還小（約當自然村），堪稱是臺灣有史以來最為精細的族群調查。調查時間最早，尚未收到殖民統

² 據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總務局學務課，《日臺大辭典》書末〈本書編纂ノ顛末〉，無頁次。

³ 「本島發達ニ關スル沿革調査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 781，頁 3-4。

治的影響，其所呈現的漢人祖籍分布，可以視為反映了清代末期的面貌。

「關於本島發達之沿革調查」(1901) (以下簡稱「沿革調查」(1901)) 是台灣第一次人口普查，可惜並沒有根據這份人口資料繪製地圖(許世融 2011: 81)。如果許世融 (2011) 上述的考證正確的話，那麼小川地圖 (1907) 正好是「關於本島發達之沿革調查」的祖籍地圖。這意味著小川地圖 (1907) 實際上並非語言地圖，而是族群分佈地圖。

最近，許世融將「沿革調查」(1901) 的資料數位化，利用 GIS 繪成地圖 (以下簡稱許世融「沿草地圖」(2014)，或簡稱「沿草地圖」)。

既然小川地圖 (1907) 和「沿草地圖」(2014) 都是根據「沿革調查」(1901) 所繪製，那麼兩張地圖應該是符合的。但從以下的比較發現，兩者並不完全符合。這些出入、落差是怎麼造成的，需要解釋。

2.1.3 小川地圖 (1907) 對於祖籍與語言分類的混淆

既然小川地圖是根據「沿革調查」(1901) 的「祖籍分類」繪製的，卻聲稱其地圖是「語言地圖」。如果「祖籍分類」等同於「語言分類」，但事實並非如此。

於原住民而言，因為民族分類主要是根據語言分類的，民族分佈地圖大概等同於語言分佈地圖。⁴對漢族而言，祖籍分佈和族群分佈或語言分佈的界線落差甚大。福建移民之中，汀州是客語分佈區，漳州也有客家人，說客語；廣東移民之中潮州、惠州也有閩南人，不全是客家人。也就是說，福建人不一定是閩南人，講閩南語；廣東人也不一定是客家人，講客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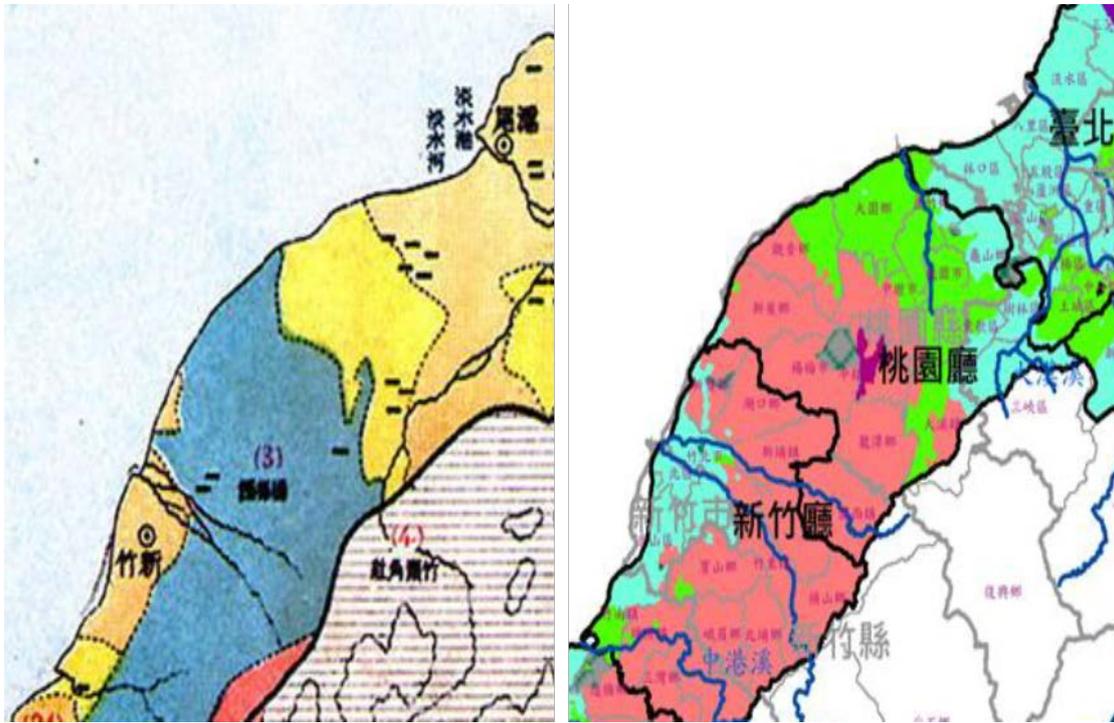
以下以西北海岸的大牛欄粵漳腔閩南語及大西螺地區的詔安客語為例，說明小川地圖 (1907) 可能的疏漏：

2.1.3.1 西北海岸粵漳腔閩南語的疏漏

小川地圖 (1907) 把西北海岸今觀音鄉南部、新屋鄉全部及新豐鄉的大部分都劃入「客人」區，比較許世融「沿草地圖」(2014) 雖然大體上一致，但粗略了一些。沿草地圖顯示新屋鄉海邊有一個漳州人點 (按即頭家厝，今新屋鄉永安漁港附近的郭厝)，西南海邊有一個泉州人小片 (按即蚵殼港，今新屋鄉蚵間村、深圳村)，另外在新豐鄉南部還有一條和一點泉州人分佈區 (按即松柏林，今新竹縣新豐鄉南部松柏村及松林村)，但在小川地圖 (1907) 這一帶除了紅毛港反映出來，其餘的零星分佈點都被劃入「客人」分

⁴ 不過原住民部落因為常常遷徙，一個部落可能是不同氏族混居，混雜著不同的方言，甚至是不同民族混居，混雜著不同語言。

佈區。兩圖比較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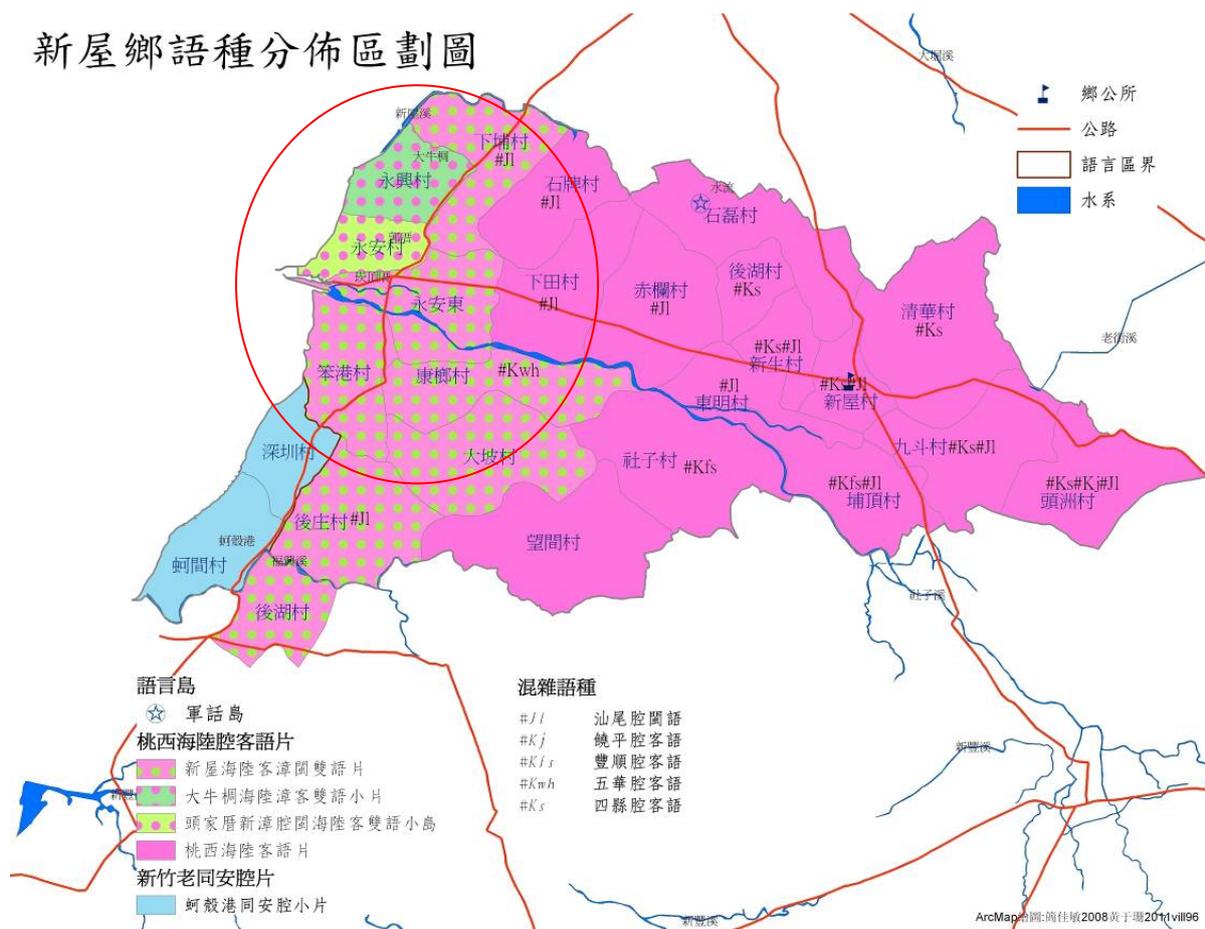


【地圖 1】小川地圖與沿草地圖台灣西北海岸祖籍分佈之比較
資料來源：摘自小川地圖 (1907) 和許世融「沿草地圖」(2014)

由上圖看來，小川地圖 (1907) 是將「沿革調查」(1901) 的資料簡化過的。小川地圖 (1907) 所參照的行政單位比原調查的大，祖籍分佈的細節被模糊掉了。

但是兩張地圖共同之點是漏掉今新屋鄉永興村還有一個閩南語島，即有名的「大牛欄方言」。有關新屋鄉的族群分佈，韋煙灶 (2010) 利用族譜地理學的方法，密集地調查當地世居家族的祖籍分佈，繪如下圖：

新屋鄉語種分佈區劃圖



【地圖 3】新屋鄉語言分佈圖

資料來源：摘自洪惟仁〈台灣西北海岸的語言分佈與閩客互動〉(2011)

如【地圖 3】所示，新屋鄉海邊有三個閩南語區，並非如「沿革地圖」(2014) 所示只有兩個。「沿革地圖」準確地把新屋西邊海邊的頭家厝漳州區和西南海邊的蚵殼港泉腔區都標示出來了，但缺漏了大牛欄方言島。新屋鄉大牛欄是一個「老粵漳腔」閩南語方言島，源自廣東陸豐縣。「粵漳腔」保守著不少古老的漳州音，但有潮州腔閩南語成份，大牛欄方言又兼揉一些海陸腔客語成份。因其特殊性，受到方言學家的特別關注，已經有多篇討論大牛欄方言的論文。⁵

大牛欄方言葉姓，主要分佈在新屋鄉西北海邊的永興村，人口三千人。但大牛欄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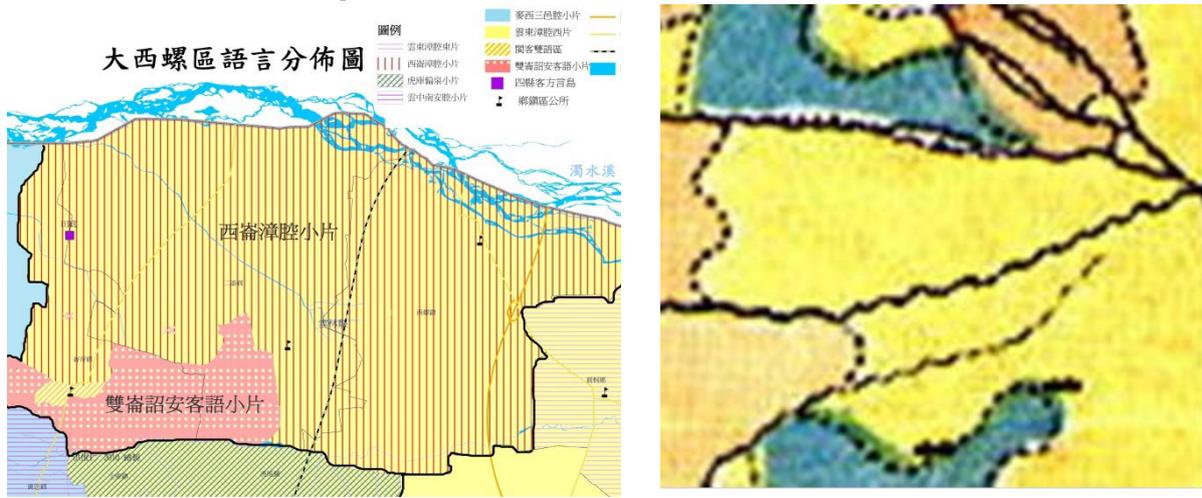
⁵ 關於新屋大牛欄（大牛欄）的語言島已經有多篇論文從方言學或社會語言學的角度進行描寫，最先是洪惟仁在《台灣方言之旅》(1992) 做了簡單的紀錄，更詳細的描寫參見洪惟仁 (1993, 2003)、陳淑娟 (2001, 2004)、張屏生 (2007: 058-061; 2007: 325-331)。

言分佈很廣，包括觀音鄉白玉、大潭二村的黃姓，廣興村埔頂、溝尾及金湖村水尾的許姓；大牛欄（永興村）、下埔頂（下埔村）、石牌嶺（石牌村）、下田心（下田村）的葉姓；東勢（東明村、新生村）、赤牛欄（赤欄村）、后莊（後庄村）及崁頭厝（永安村）的姜姓；九斗、上青埔（九斗村），犁頭洲（頭洲村）、埔頂（埔頂村，姓許與觀音許姓同宗）、新屋（新生村、新屋村）的羅姓（【地圖 3】標示#kl 符號的村莊）。甚至遠及楊梅鎮。祖籍同為廣東惠州府陸豐縣的閩南人，在新豐鄉還有鳳坑村海邊的姜厝和上坑村鄭厝，但因受到周邊老同安腔影響，已經變成新漳腔，沒有老粵漳腔特色（以上詳參洪惟仁 2011）。

新屋鄉說大牛欄方言的閩南人估計人口大約一萬人。與海陸客錯雜混居，除了自己的老粵漳腔閩南語之外都兼通海陸話，但以大牛欄為中心，隨著年齡層下降，也隨著越遠離大牛欄，越傾向於被海陸客家同化，不但發生語言轉移，甚至牽連族群認同轉移，不少老人都已經自認是客家。但老一輩都還堅持自己是「鶴佬」（Hòh-ló，閩南人），百年前應該還沒有發生語言轉移或族群認同轉移的事。許世融「沿草地圖」（2014）沒有把這些粵漳腔閩南語的族群與語言標示出來，主要原因是「沿革調查」（1901）本來是祖籍分類調查，只是小川尚義誤以為語言分類等同於祖籍分類，所以把他的地圖（1907）看成是「台灣言語分佈圖」。我們根據語言地理學的共時研究，證實許世融「沿草地圖」（2014）比小川地圖（1907）精密，但兩者都是祖籍地圖，要當成語言地圖使用必需審慎地比對其可能的誤差，否則可能會發生誤解。

2.1.3.2 大西螺地區的詔安客語的疏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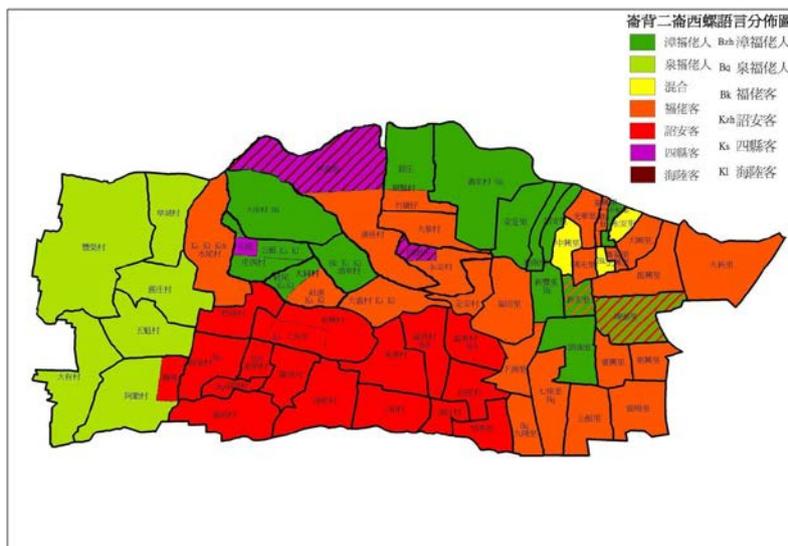
小川地圖（1907）的語言區劃最大的錯誤是把西螺、二崙、崙背全部劃入漳州語區（閩南語）。大西螺地區的主要人口的確來自福建省詔安縣，但詔安縣移民的後裔中，不完全是漳州的閩南人，其中有一部份客家人，分佈在二崙、崙背南部，至今仍然使用著詔安客語（洪惟仁 2010c）。我們把現代大西螺地區的語言地圖和小川地圖（1907）作一個比較如【地圖 4】：



【地圖 4】大西螺區語言分佈圖（左）與小川地圖大西螺部分（右）比較
資料來源：引自洪惟仁〈雲林縣的語言分佈〉(2010)

上面左圖是我們根據最近的調查所繪製的語言地圖，地圖顯示大西螺地區的西南部即崙背東南部、二崙南部（紅色塊）至今還說詔安客語；右圖摘自小川地圖（1907）的大西螺部份，地圖把整個大西螺地區全部劃入漳州語區。

這個落差是怎麼產生的呢？如果相信大西螺是漳州語區，那麼客語居民是不是後來才遷入的呢？吳中杰（2010）進行了大西螺的語言使用，並且也調查其祖籍，並把原本講客語，今已轉移講漳腔閩南語的所謂「福佬客」分佈一併繪製如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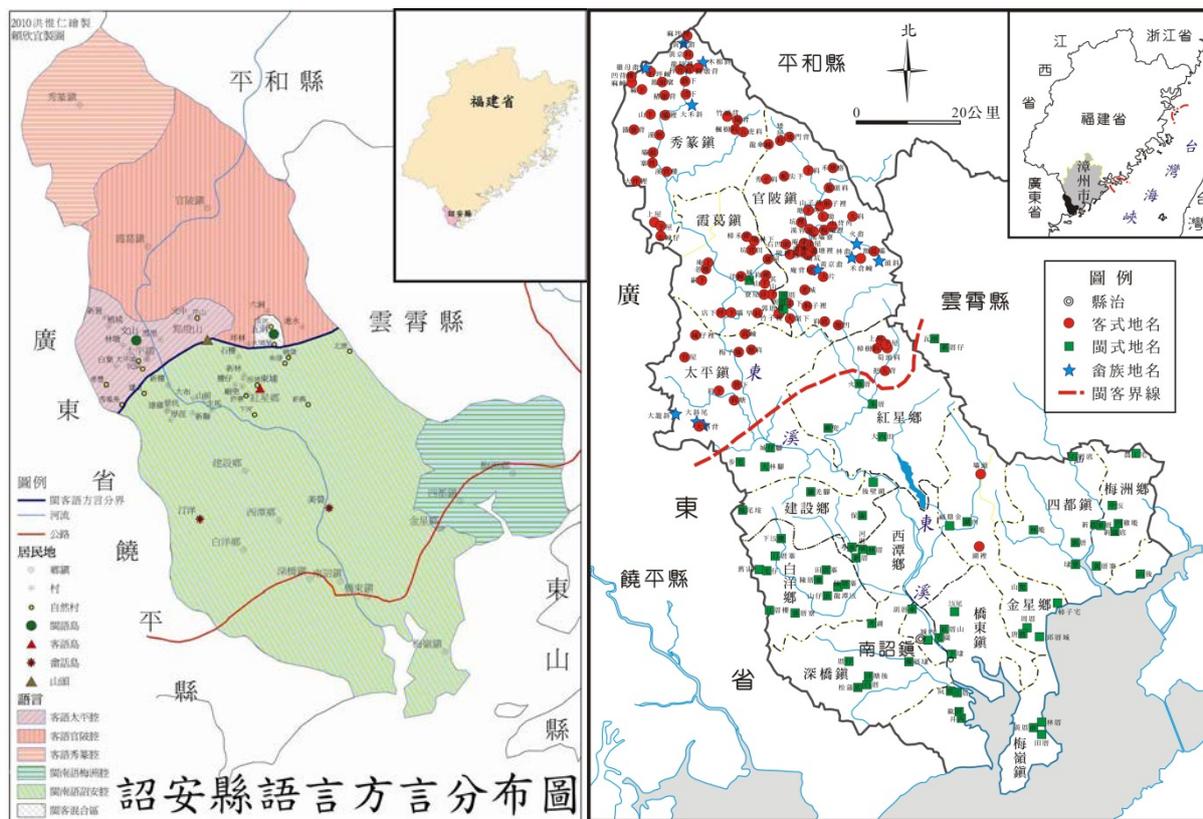
【地圖 5】吳中杰「崙背二崙西螺語言分佈圖」

資料來源：吳中杰〈大西螺地區閩、客語言與移民源流研究〉(2010)

大西螺地區講客語的分佈在南部幾個村落，如果連客家人但已經不會講客語的所謂「福佬客」，則佔了本區的大部分，漳州人分佈在北部。由圖可見，大西螺的「漳州人」不一定都講漳州閩南語，至少南部地區現在還說詔安客語，中部地區則轉移講閩南語，這是近百年來的發展。

韋煙灶 (2010) 調查崙背地區居民的祖籍，發現其西部泉州籍人和東部漳州籍人的分佈區涇渭分明。西部世居居民主要來自泉州晉江，東部世居居民主要來自舊漳州府詔安二都的秀篆、官陂，也有部份南靖、平和縣移民。而詔安二都屬於客家分佈區。

韋煙灶從崙背自然村的地名發現許多客式地名，譬如「崙背」，「背」明顯的是客語用詞，閩式地名用「後」字，不用「背」。韋煙灶 (2010, 2013) 追蹤這些客式地名在漳州詔安縣的分佈，發現正好分佈於詔安縣北部的秀篆、官陂、太平、紅星等鎮的客語區。為了確定詔安縣的語言分佈，本文作者曾和韋煙灶教授一起前往詔安進行語言調查，確定詔安縣的語言分佈，閩南人約佔三分之二；客家人約佔三分之一，閩客分界相當明確，調查結果印證了韋煙灶運用地名地理學繪製的閩客分佈地圖。作者和韋煙灶分別從語言地理學和地名地理學的立場，繪製兩張詔安縣的閩客分佈地圖，對照如下：



【地圖 6】兩張詔安縣閩客分佈地圖的比較

資料來源：左圖引自洪惟仁（2010）「詔安縣語言方言分布圖」；右圖引自韋煙灶（2010）「詔安閩客地名分佈地圖」。韋煙灶（2013）另將閩客分界線套疊，重繪成一張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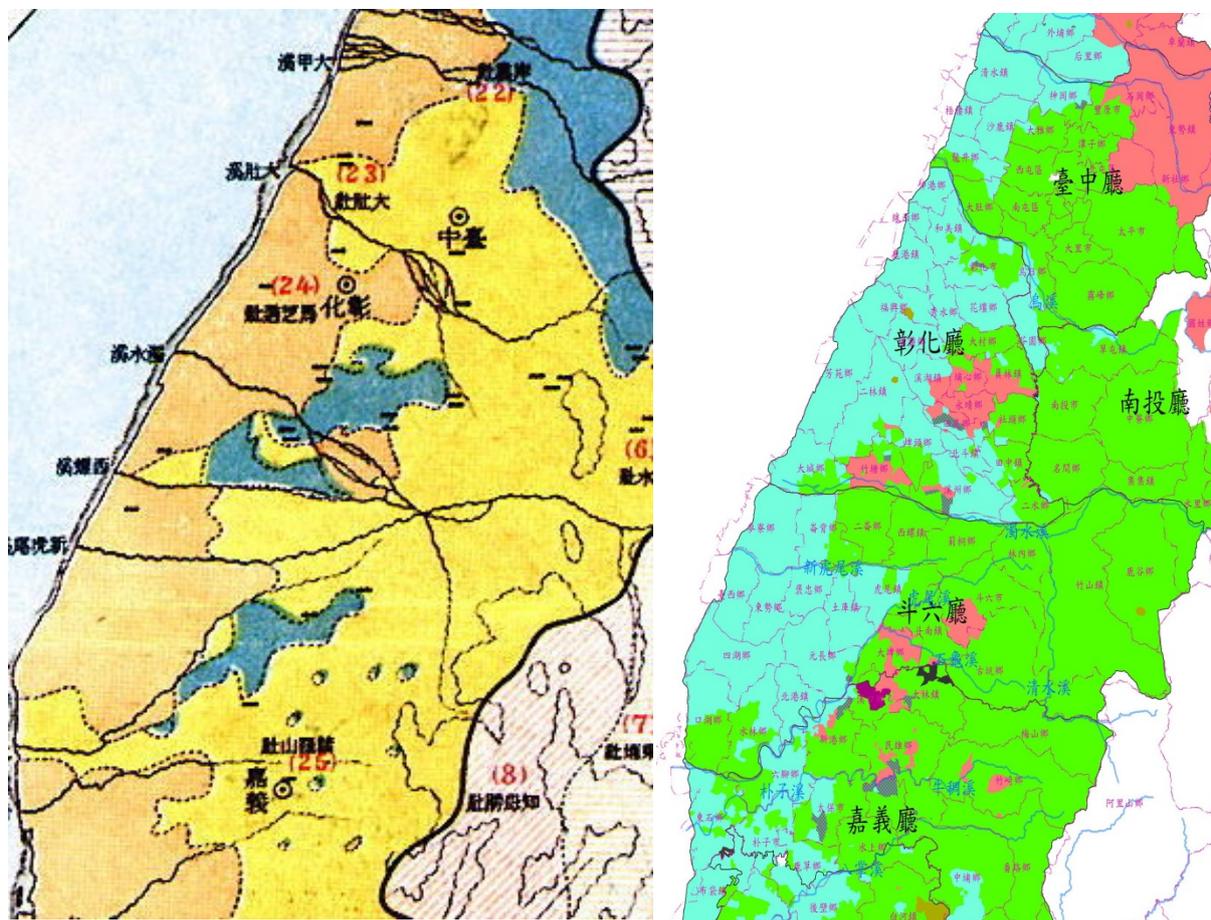
由此可見，大西螺地區居民的祖籍是很明確的，對照其原鄉的使用語言、地名用詞也都若合符節，證明大西螺的客語人口直接源自詔安原鄉，不是由臺灣其他地區遷來的二次移民。只是台灣的詔安客已經有很多人轉移說閩南語了，這部分才是真正語言接觸產生的語言地盤的改變。小川地圖（1907）把漳州的詔安人都當成是閩南語漳州話的使用者，顯然不符事實。因為這個誤解造成語言地圖的誤差。至於現在有不少人把所有的詔安籍移民都看成是客家人，這又是另一種極端的錯誤。

2.1.4 推斷小川地圖（1907）是祖籍分布圖的證據

小川地圖（1907）沒有把大西螺地區的客語分佈區標示出來，但是我們卻發現，在他的地圖上豐原、員林、永靖，竹塘，大埤、溪口卻散佈著很多「客人語」島。而根據我們的調查，這些地方現在都已經不說客家話了，猜測一百年前小川尚義繪製地圖的時代，即使當地的客語還在使用，其優勢語言已經變成閩南語，而不會是客語。

為什麼小川尚義要把當時即將消失的客語畫在地圖上，卻把至今尚存的大西螺客語

疏漏了呢？唯一的可能是小川尚義根據的不是語言使用調查資料，而是祖籍資料。試比較許世融根據總督府（1901）的祖籍資料繪製的地圖（許世融「沿革地圖」2014）便知：



【地圖 7】小川地圖（1907）與許世融「沿革地圖」（2014）的比較

資料來源：左圖引自小川尚義《日臺大辭典》（1907）附圖；右圖是許世融根據「沿革調查」（1901）所繪製

比較兩圖，有關客人／廣東人的分佈區可謂若合符節，大西螺地區現在仍存在的詔安客語島被劃入漳州區，沒有出現在地圖上；已經不說客語的「廣東人」島散佈在各地，這種落差顯示地圖反映的不是語言分佈狀態，而是祖籍分佈狀態。

由此可以斷定小川地圖（1907）並非根據實際的語言調查資料，而是根據漢人祖籍分佈資料所繪製。除非我們可以找到可能提供小川尚義繪製地圖（1907）的其他資料，就目前的史料而言，小川地圖繪圖的依據唯一的可能，如許世融（2011）的考證是根據總督府 1901 年的漢人祖籍調查資料。

總之，就漢人部分而言，小川地圖（1907）是不折不扣的族群分佈圖。

2.2 繪圖原則造成的落差

不同的文獻，因為參考行政單位的大小不同造成地圖精細度的落差。這種落差不是因為地圖繪製技術的落差，而是因為地圖繪製者所根據的參考行政單位大小不同。行政單位大的地圖沒有辦法容納許多細節的資訊，作者的策略可能以行政區域的邊界為語言分佈區的分界線，造成以偏概全的現象。

小川地圖（1907）於「熟番」（平埔族）部分是以點狀標示其分布位置，而漢人分布則是以區塊標示，即把一個行政區域內統計上的優勢語言繪製在地圖上，致使弱勢語言因為統計上屈於少數而沒有機會出現在地圖上，這是統計代表性的問題。地圖中永和（方言屬於老同安腔）被畫入漳州區，桃園新屋海邊的閩南語分佈區被畫入客語區（大牛欄應該屬於漳州腔，蚵殼港應該是同安腔），高屏地區客家話的分佈區超出實際範圍（六堆客語群島的東邊應該是道卡斯族閩南語的分佈區），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參考的行政單位太大，抹殺了弱勢語種在邊際地帶的存在。

比較小川地圖（1907）和許世融沿革地圖（2014）（參見【地圖 7】），我們發現小川地圖比較粗略，這些差異不完全可以用參考行政單位太大來解釋。以下以中閩州⁶為例作個說明。中閩州現在只剩下崙背、二崙南部一小部分村落還使用詔安客語，其他地區的客語島都已經消失。但如上（2.1.3.2 節）所述，詔安客語島沒有出現在兩張地圖上，卻標示著不少粵人移民島。島民的屬性沿革地圖叫做廣東人，小川地圖稱為客人，值得注意的是兩張地圖的粵人分佈範圍有相當的差距，茲列舉 9 個差異處：

- 1) 員林：沿革地圖在彰化員林地區有一塊廣東人分佈地，小川地圖客人區比較大，不但把員林整個劃入，還延伸到舊濁水溪以西的埤頭鄉北部。埤頭鄉北部在沿革地圖劃入泉州區。依照涂文欽（2011）此地屬於新同安腔區，不是客語區，沿革地圖比較能夠反映語言分佈實況。
- 2) 竹塘：兩張地圖分佈方位類似，但分佈區形狀不同，小川地圖的客人分佈區比較大。
- 3) 溪州：沿革地圖在溪洲西部有一小塊廣東人島，小川地圖把溪洲西部大部分劃入客人區並與竹塘客人區連接。
- 4) 斗南：沿革地圖斗南全部劃入漳州人區，小川地圖把斗南劃入客人區，致使

⁶ 所謂語言「州」的概念詳參洪惟仁〈台灣的語種分佈與分區〉（2013）。所謂「中閩州」指台灣中部的閩南語分佈區，由桃園新屋鄉蚵殼港以南，新竹、苗栗的濱海地帶、台中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到嘉義縣的一大片閩南語分佈區。其方言分佈大勢是「海邊偏泉，內陸偏漳」。

斗六南部和斗南、大埤、溪口等連成一大片客人區。

- 5) 大埤：沿革地圖大埤的廣東人只是一部分，南部一小部分和溪口（潮州）、大林相接，小川地圖把大部分地區都劃入客人區。
- 6) 溪口：沿革地圖把溪口劃入潮州人區，小川地圖把溪口劃入客人區，顯示潮州人被小川歸入客人類。但其分佈狀態也不一樣。
- 7) 新港：沿革地圖在新港劃出現兩個廣東人優勢村落，小川地圖合併為一小塊。
- 8) 民雄：沿革地圖在民雄鄉有兩三個廣東人島，小川地圖只有一小點。
- 9) 嘉義東部：兩張地圖在嘉義東部都散佈著幾個粵人優勢村，但地點不一樣。沿革地圖在梅山、古坑沒有廣東人島，小川地圖有三個；沿革地圖在竹崎有兩個廣東人島，小川地圖只標示一個小島。

比較兩張地圖的中閩州部分，雖然粵人分佈區彷彿相似，但由以上 9 個地點的比較看來，落差不小，差不多沒有一個地方的分佈區是符合的。

如果我們相信許世融 (2011) 的考證，小川地圖 (1907) 是根據「沿革調查」(1901) 的資料繪製的，又假設地圖的繪製完全根據人口統計方法，兩張祖籍分佈圖應該相當符合才對。兩張地圖落差的原因可能如下：

- 1) 地圖繪製技術不同：台灣總督府「關於本島發達之沿革調查」(1901) 本來沒有地圖，本文所引用的「沿革地圖」(2014) 是許世融教授利用 GIS 繪製的，而小川地圖應該是手繪的。並且相信這張地圖的繪製也決不是小川尚義本人所繪，應該是總督府民政課在小川尚義的指導下，利用其土地測量資料繪製的。繪製者在繪製的過程中加入個人的想像是有可能的。
- 2) 人口數據的統計方法不同：「沿革調查」(1901) 的人口統計是相當精細的，許世融教授根據這些數據，逐「街」統計，把優勢祖籍繪製在地圖上；但不知小川尚義根據什麼統計方法決定優勢族群，可能有些地方加大行政單位層次，模糊了「街」的分界細節；或者有什麼加權原則，因而擴大了客家分佈範圍，不得而知。

以上因為錯誤所產生的落差必須通過現代方言地理學、祖籍地理學、人類學的研究成果，還原當時的族群語言分佈實況，比較現在的分佈狀態，才能重建真正的語言地理變遷史。

2.3 歷史演變造成的落差

但比較小川地圖（1907）與現代的分佈圖（洪惟仁 2013），扣除了上述因為誤解或製圖技術產生的誤差，剩下的落差可能是歷史演變造成的了。所謂「歷史演變」可能包括：

- 1) 區劃改變：行政區劃改變，所繪製的地圖自然會不同。這個問題套疊現代行政區劃，如許世融「沿革調查」（2012）的辦法可以解決。
- 2) 地名改變：地名改變，所繪製的地圖自然會不同。這個問題對照古今地名可以解決。
- 3) 族群遷徙：族群遷徙的結果，遷出地被遷入者所佔，族群與語言分佈地盤自然改變。如噶瑪蘭平埔族遷到花蓮，西部平埔族遷到埔里，南部西拉亞平埔族遷到花蓮、台東，恆春阿美遷到台東；桃竹苗客家向中南部二次遷徙等造成語言分佈區的變化。
- 4) 語言轉移：除竹塹社的道卡斯族遷入客語區內被客家同化之外，閩南語區和平埔族被閩南語就地同化，全部改講閩南語；福建客家被閩南語同化，除雙崙詔安客語島之外，零星分佈的客語島全部消失。語言轉移之後造成認同改變，直接影響祖籍人口統計數字，日治時代進行族群調查時可能已經發生認同轉變的現象了。上述斗六、大埤、新港、民雄的廣東人區在總督府 1928 的漢人鄉貫圖中都消失，劃入漳州人區，除了行政區域較大模糊了弱勢語言的存在，部分原因可能是當時的廣東客語或潮州話已經轉移講漳州話，認同認同隨著改變，因此歸入漳州人區。⁷
- 5) 語言融合：相同的語言、方言之間也可能發生融合。閩南語和客語互相接觸，語言發生競爭、移借是難免的，但語言成分的流向幾乎是單向的，客語吸收了大量閩南語成分，閩南語很少受到客語影響。當然客語對閩南語也不是完全沒有影響，最明顯的是閩南語〈入〉字頭崩潰的潮流中，因客語接觸影響，在漳腔區中新生了一個 g 變體，並由接觸地向周邊擴散（洪惟仁 2013b），但閩南語吸收客語成分的情形的確很少，並且也只是區域性現象。台灣語言

⁷ 這個地區正好是大埤三山國王廟 53 聯庄的分佈區，應該是潮州籍人分佈區，過去當地人都認同閩南族群，現在因為客家運動的影響有很多人改而認同客家人。但三山國王主要是潮州閩南人的信仰，也傳播到部分舊潮州府客家地區，信仰三山國王不一定是客家人，更可能是潮州閩南人。斷定這個地區的三山國王信仰者是閩是客，必須運用族譜地理學的方法，才能斷定。

接觸所產生的融合最普遍的是閩南語漳州腔、泉州腔兩種方言之間所謂的「漳泉濫」。閩南語漳泉混合程度非常嚴重，目前已經找不到純漳腔或純泉腔的方言，都是混合方言。客語方言之間也有交流，但融合的程度遠不及閩南語。方言融合大部分限於四縣、海陸交界地帶，但無論怎樣融合，方言之間仍然涇渭分明。但閩南語漳泉之間的融合情形相當普遍，尤其是南閩州的閩南語完全分不出是漳、是泉，不得不歸類為「混合區」。混合區的形成，使得研究者無法認定閩南語居民的原鄉是漳、是泉，至於更細節的原縣、鄉鎮，除非有族譜記載，更不可能認定了。

以上 5 項，前 2 種情形只是改變地圖的表面，並沒有改變語言分佈的實際，比較容易解決。我們所關心的是第 3 項到第 5 項。這三種改變才真正改變了地圖的面貌。

小川地圖 (1907) 發表至今已經超過一百年。排除了本節 2.1、2.2 所述的誤差，剩下第 3 項到第 5 項應該就是一百年來台灣語言地理史上真正發生的語言地盤的變遷。茲就各類舉例說明如下：

2.3.1 族群遷徙

比較兩張古今地圖：小川地圖 (1907,【地圖 11】) 和洪惟仁地圖 (2013,【地圖 13】) 可見，閩南、客家和南島語之間的分佈格局在一百年前差不多已經大勢底定了，但細節部分卻不斷在變遷。因為族群遷徙而連帶發生語言地盤的變遷有三種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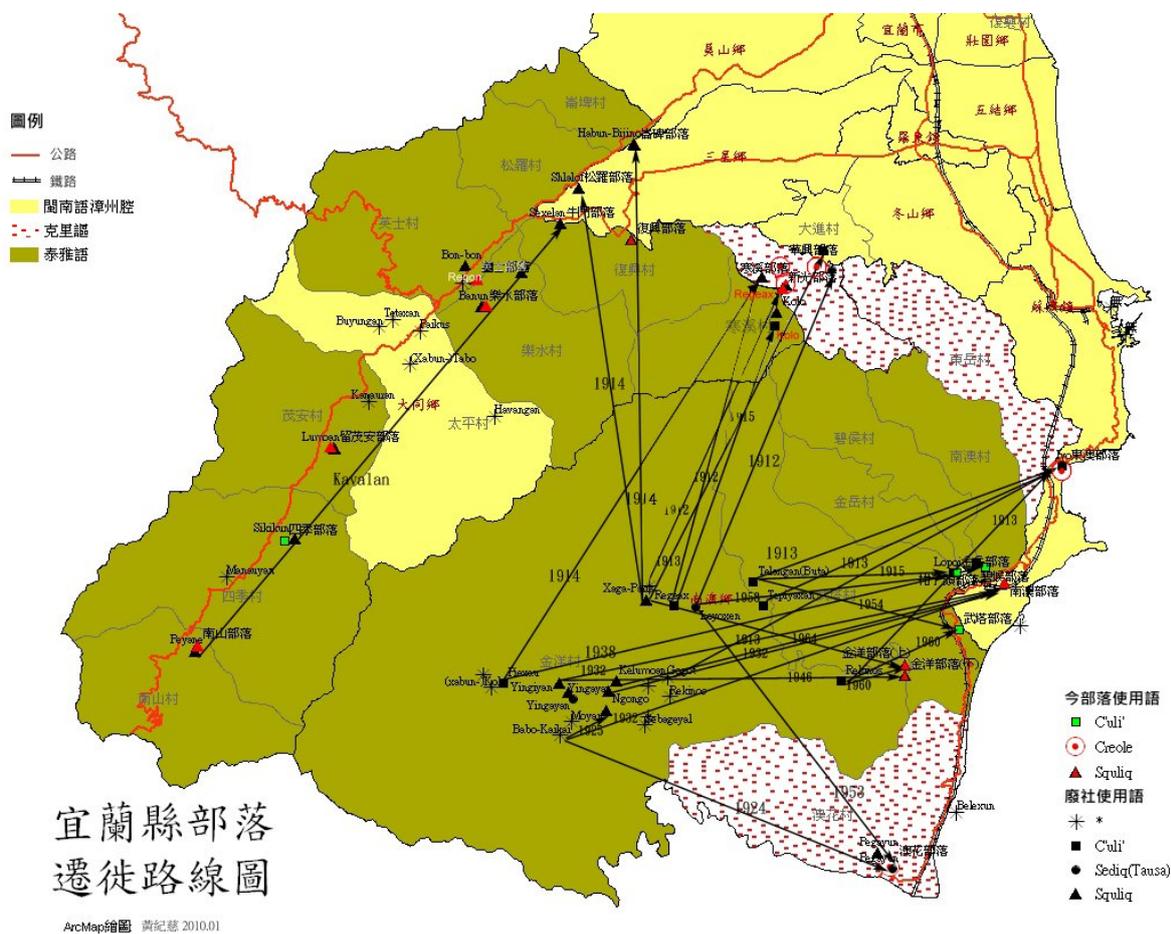
- 1) 台灣總督府及國民政府為了統治方便，強迫原住民由深山向淺山遷徙；
- 2) 漢人不斷向內山侵墾，原住民傳統領域不斷向內山縮小；
- 3) 漢人深入內山移墾，成為漢人與原住民混居，或形成漢語島的局面。

下面舉三個實例說明：

2.3.1.1 原住民被迫遷村

日治時代至國民政府蔣家時代，原住民有許多被迫遷村的事件，尤其是東半部的宜蘭、花蓮、台東山區。以宜蘭縣為例，泰雅族自二百年前即自主性的向北遷徙，遷往宜蘭縣南澳、大同兩鄉的泰雅族早期住在深山中。清代基本上放任自然，但是日治之後，為了樟腦與原始森林開發，先是以撫綏政策，消極「防蕃」，但是蕃害頻仍，1903 年起轉趨強硬，開始「討蕃」，設置隘勇線，架設通電鐵絲網，步步進逼，並以封鎖食鹽、砲擊部落、收繳銃枝等強力手段，逼使泰雅族就範。1912 年起開始積極勸誘泰雅族由南澳鄉地帶遷到淺山、近山地帶，建立新部落。這個政策持續進行，直至民國以後仍然陸續遷徙，南澳鄉的深山部落全部被遷到淺山地帶。其遷徙路線及遷徙後形成的新部落，對

照如下圖：



【地圖 8】宜蘭縣原住民部落原址及其遷徙路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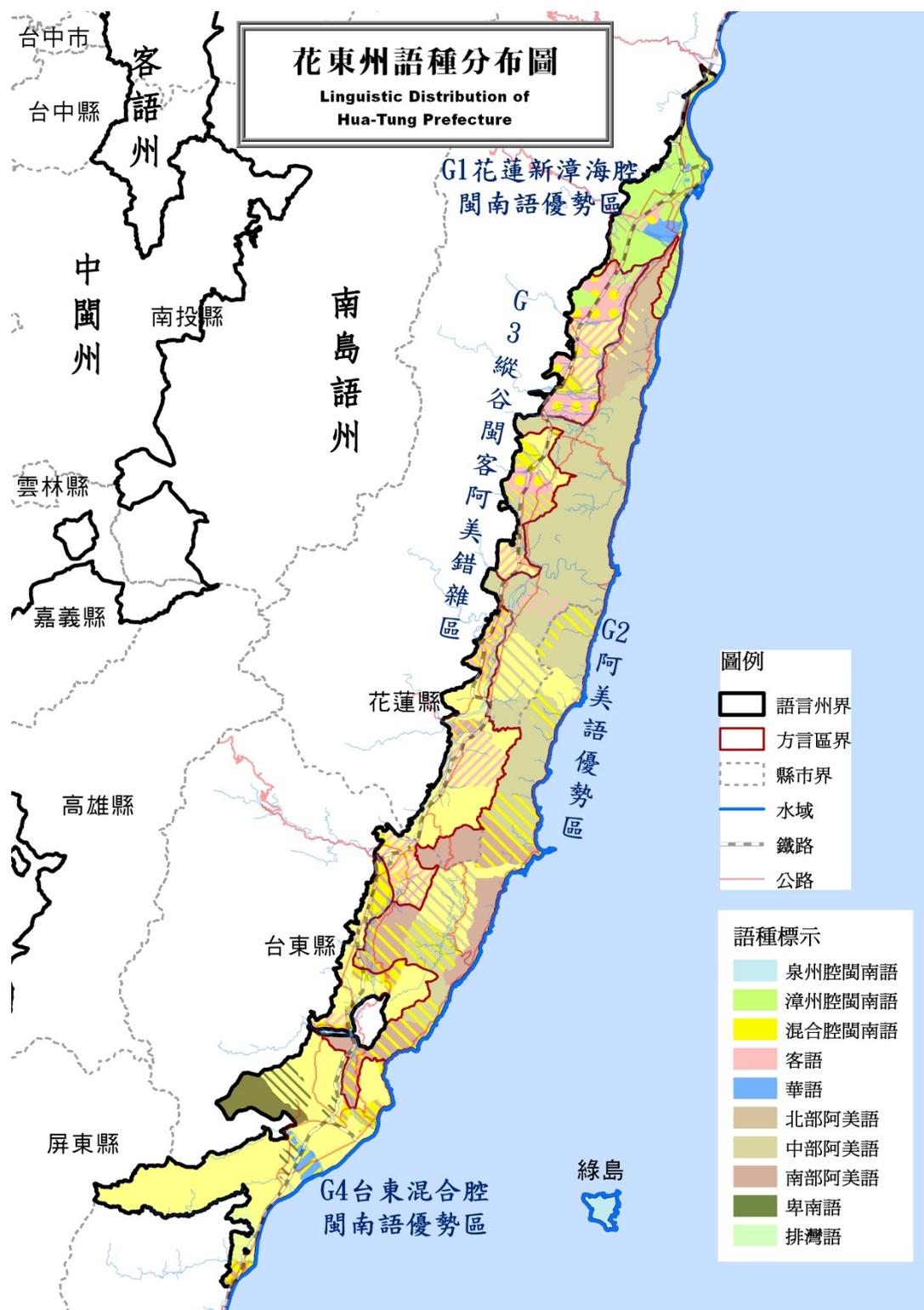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泰雅族部落分佈原址根據移川子之藏等（1935）所附〈系統別分布地圖〉「アタヤル族」部分。遷徙路線根據南澳鄉公所編《南澳鄉簡史》（2002）。本圖乃作者將原址之經緯度輸入資料庫，利用 ArcMap 9.1 與現在部落套疊重繪而成。地圖背景為今語言分佈圖，黑色符號為原住民部落原址，彩色符號為今泰雅族部落分佈位置及其使用語言。（原載洪惟仁 2010b）

如圖所示，今南澳鄉深山已經沒有居民，原住民部落全部分佈在淺山地帶，這完全是被迫遷村的結果。

2.3.1.2 漢人大舉遷徙花東

台灣東半部在清代叫做「後山」，是漢人足跡罕至的地方，但是自從 1797 年吳沙帶領漳州人拓墾宜蘭之後，所謂「後山」就只剩花蓮、台東了。後山本來原住民東遷的新

天地，大部分南島民族在歷史上都一直向郊後山，然後花東地區遷徙，漢人算是後到的新移民。1874 年牡丹社事件之後，清政府改採開山撫番政策，漢人勢力才開始靠國家力量入墾花東地區。雖然經過幾次原住民反抗（如噶瑪蘭族和撒奇萊雅族 1878 年聯手抗清的加禮宛事件），都被吳光亮平定，只好任由漢人入墾；1895 年台灣割讓日本，日本在花東地帶也開墾了許多農場，作為日本農民的移民村；同時西部的客家人、閩南人也紛紛向花東地區移民；戰後新一批的外省人又在國民政府的安排下移住花東（下圖中代表華語的藍色區塊分別是安置退伍軍人的花蓮農場與台東知本農場），造成如今花東州閩南語、客語、阿美語、卑南語、華語錯雜分佈的狀態（詳參【地圖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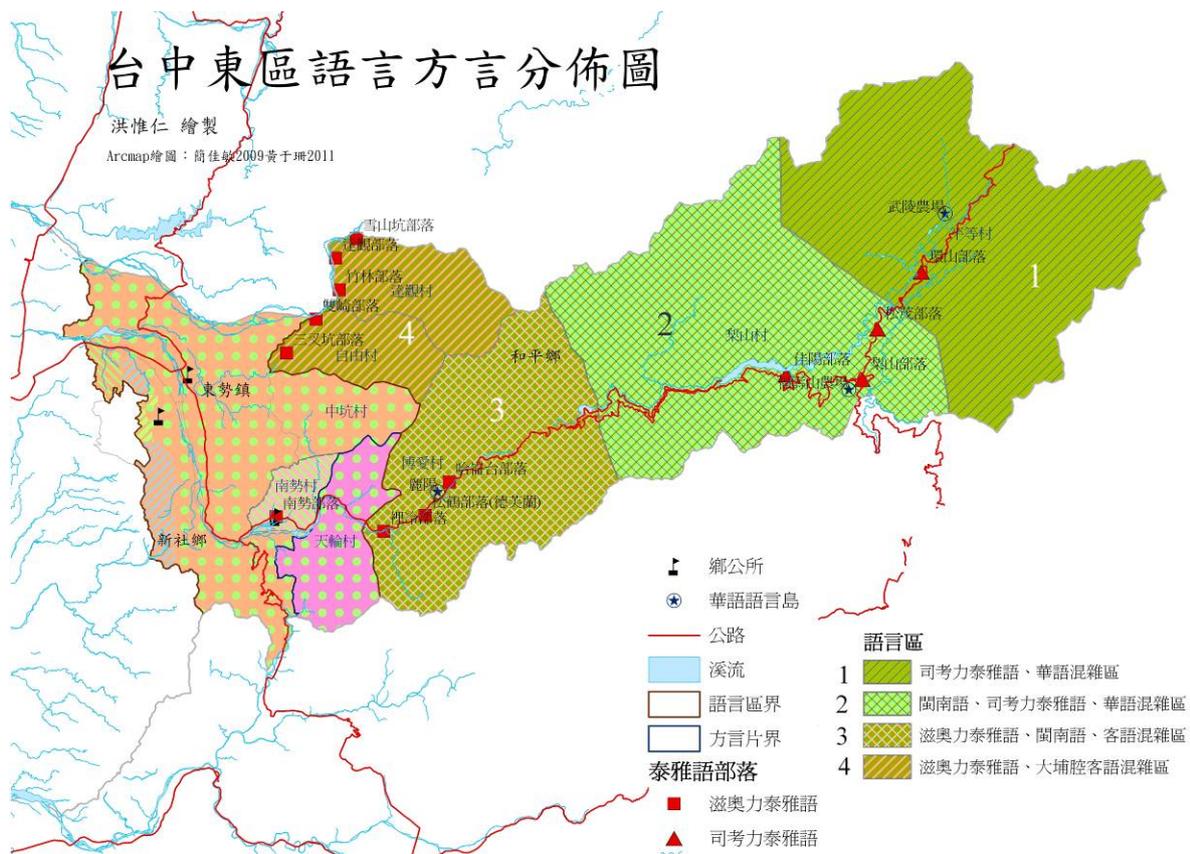
【地圖 9】花東州語語種分佈圖

資料來源：引自洪惟仁〈台灣的語種分佈與分區〉(2013a)

小川地圖 (1907) 上，整個花東州，除了綠島為泉州人區，花蓮海邊、台東市區以及海岸山脈海邊及花東縱谷零星散佈著幾個漳、泉雜居點之外全部是阿美族(台東以北)及卑南族(台東平原)的分布區。比較洪惟仁地圖 (2013)，可以推斷兩個時代花東地區語言地盤的差異，主要是百年來族群遷徙造成的結果。

2.3.1.3 漢人移墾內山

雪山山脈及中央山脈、阿里山山脈一大片土地，屬於清代以來所謂的「內山」。如小川地圖 (1907, 【地圖 11】) 所示，內山是南島語的分佈區，清代以來所謂「番界」(漢地與番地之間的分界線) 一直不斷向內山方向移動，通過日治時代和國民政府時代近百年間，原住民邊界向內山縮小的趨勢並未改變。比較洪惟仁地圖 (2013, 【地圖 13】)，南島語地盤不但往深山方向縮小了，從阿里山鄉、信義鄉以北的深山地帶，所有山地鄉村落都被漢人入墾了。最嚴重的是台中縣和平鄉，原住民的泰雅族只剩全鄉人口的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二人口主要是漢人，其中客家人最多，其次是閩南人和外省老兵及其後代。如下圖所示，和平鄉已經沒有一個村是純原住民村，卻有幾個純客家村。



【地圖 10】台中縣和平鄉語言分布圖

資料來源：洪惟仁 2012 繪製

如【地圖 10】所示，海拔最高的平等村是司考力泰雅語 (Squiliq Atayal) 和華語的混雜區，沿大甲溪而下，漢人愈來愈多，梨山村是閩南人和司考力泰雅語和華語的混雜區，博愛村是茲奧力泰雅語 (Ts'oli' Atayal) 和閩南語、客家語的混雜區，大安溪南岸的達觀村是茲奧力泰雅語、客家語的混雜區。往西，除鄉公所所在的南勢村還有一些泰雅族混居之外，全部被客家人所佔住。本鄉的客家人大部分講大埔腔客語，天輪村講海陸腔客語。因此在地圖中，我們已經把這幾個村劃入客語州的大埔腔區了。

總之，和平鄉原是泰雅族的傳統領域，本土的泰雅語有司考力 (Squiliq) 和茲奧力 (Ts'oli') 兩種方言，語言相當單純。【地圖 10】所示台中縣和平鄉五花八色的語言分布狀態完全是近百年來，尤其是戰後漢人入墾所造成的結果。

2.3.2 語言轉移

語言轉移 (language shift) 指的是 A 民族，原來講 a 語言，因為長期和 B 民族接觸，改說 b 語言，因而造成民族系屬與語言系屬的落差。在台灣語言轉移很多，主要有三種情形：1) 南島民族改說漢語，謂之「平埔族」；2) 客家人改說閩南語謂之「鶴佬客」；3) 南島民族改說日語，謂之「日語客里謳」。分述如下：

2.3.2.1 平埔族

小川地圖（1907，【地圖 11】）熟番（平埔族）部落用點狀符號標示其居住位置，沒有註明部落名稱，民族類別，或語言類別。他和淺井惠倫發表《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說集》（1935）附錄了一張「台灣高砂族言語分佈圖」（【地圖 14】），不但標示熟番位置，而且標示其民族名稱，並將當時南島民族語言使用情形分為三類（小川尚義、淺井惠倫 1935: 3-4，以下引用之族名延用原文拼音）：

- 1) 使用固有語言：Atayal（泰雅）、Seedeq（賽德克）、Saisiyat（賽夏）、Bunun（布農）、Tsou（鄒）、Kanakanabu（簡仔霧）、四社蕃（Saaroa）、Rukai（魯凱）、Paiwan（排灣）、Piyuma（卑南）、Ami（阿美）、yami（雅美，今稱達悟 Tao）。大約相當於清代「生番」之類。
- 2) 相當程度使用固有語言：Kavalan（噶瑪蘭）、Pazeh（巴宰）、Sao（邵）。大約相當於清代「歸化番」之類。
- 3) 已不使用固有語言，但仍記憶極少量的古詞：Ketagalan（凱達格蘭）、Taokas（道卡斯）、Papora（帕波拉）、Babuza（巴布薩）、Hoanya（和安雅）、Siraya（西拉亞）。大約相當於清代的「熟番」之類。

第 1 類的描寫到現在大體上仍然適用，但很多原住民青少年已經不會族語，有消失

的危機；第 2 類的 Paze 現在已經死亡，Sao 奄奄一息，Kavalan 苟延殘喘；第 3 類，現在除了 Siraya 祭司在祭祀的時候還會說一些族語，一般人是不會說了。平埔族南島語消失之後，平埔族也隨著消失在漢族之中。

既然第 3 類已經不使用固有語言，小川地圖 (1907) 還標示著「熟番」的位置，說明其地圖標示的是「傳統語言」，不是「使用語言」。

比較現在的南島語使用狀況，小川尚義 (1935) 所描寫的原住民 3 類族語使用情形都要降一類，第 1 類逐漸變成第 2 類，第 2 類逐漸變成第 3 類，而第 3 類同化於漢族，族語完全消失。因此在洪惟仁地圖 (2013) 上沒有標示。

平埔族語言轉移通常以閩南語為目標，唯部分 Taokas 改說客語；至於第 1 類（即現在所謂的「原住民」）則通常改說華語。這些語言轉換造成的地盤變化也反映在小川地圖 (1907) 和洪惟仁地圖 (2013) 的差異上。

2.3.2.2 鶴佬客

俗所謂「鶴佬客」(Hóh-ló-kheh 閩/Hók-ló-hák 客) 指的是不會說客家話而改說閩南語的客家人。因為小川地圖 (1907) 混淆了閩粵與閩客的分界，如本文 2.1.3 節「小川地圖 (1907) 祖籍與語言的混淆」所述，有一些福建客家分佈區（如大西螺地區）被劃入「漳州人」區，同時有些潮州閩南話也被歸入「客人」語。因此從地圖上看不出鶴佬客因語言轉移造成的語言地盤的變化實況。但是透過族譜地理學研究，依目前調查，分佈在閩南語區的鶴佬客已知有：

北閩州：台北縣三芝鄉永定客，淡水鎮車埕饒平客，台北縣土城、宜蘭縣壯圍等地的漳州客，桃園縣八德市詔安客。

中閩州：台中縣豐原市大埔客，彰化縣埔心、員林、永靖、竹塘、溪州等鄉的饒平客；大西螺（西螺、崙背、二崙）南部詔安客；雲林縣斗六南部及大埤、溪口、新港北部，嘉義縣溪口、新港、民雄、竹崎可能是饒平客。

南閩州：東山、安定、左鎮、南化（饒平客？）；車城、滿州（四縣客）。

這些地區的客家人，通常是和閩南人（特別是漳州人）混居，除了崙背、二崙的詔安客，至今仍然保存詔安客語，兼通漳州腔閩南語，其餘都改說閩南語。

2.3.2.3 日語客里謳

日治時代日語是標準語（當時稱為「國語」），一般受過教育的台灣人都會說日語，因此日語是台灣漢人及原住民各民族之間的共通語。二次大戰之後隨著日本敗戰，日語

退出臺灣，卻留下了一個紀念品，即分佈在宜蘭縣大同鄉寒溪村及南澳鄉的東岳村及澳花村、金洋村的日語客里謳 (Japanese creole) (詳參【地圖 7】，白底紅點的區塊及金洋村的客里謳語言點標示即是)。這種客里謳是日語和泰雅語的詞彙及語法成分的混合，也摻入一些華語詞和閩南語詞。語法上雖以日語為基調，但經過嚴重的簡化、變形，是一種新生的語種 (詳參真田信治、簡月真 (2008, 2009))。

2001 年原住民母語能力檢定時，宜蘭的日語客里謳以非原住民語言而被排除在外，經過居民的積極爭取，終於以「寒溪泰雅語」的名義被承認為泰雅語的一個方言而被納入母語能力檢定範圍，可惜的是 2011 年又被排除於原住民語認證考試的科目之外，改考 Sguliq 泰雅語。無論名稱或語言認定考試的科目如何，從語言學的觀點來看，它應該是一種日語客里謳。

真田信治、簡月真 (2008, 2009) 對宜蘭日語客里謳的使用情形有詳細的觀察與描寫。根據這個描寫，日語 creole 形成於日治時代受日語教育的原住民，然後傳給現在已經是中、老年的下一代，取代了傳統的族語。日語客里謳最通行的年齡層是 30 至 69 歲的中、老年層，70 歲以上還會說族語，69 歲以下多半不會說了，59 歲以下開始，客里謳、華語並用，29 歲以下則轉移為以華語為主要語言。在不到一世紀之間，由族語→日語→華語不斷轉換，語言轉移 (language shift) 速度之快令人稱奇。

為什麼只有這三個村會變成日語客里謳，洪惟仁檢查移川子之藏等 1935 地圖，發現這個地區是賽德克 Tausa 方言和泰雅語各方言的混雜地，賽德克語和泰雅語本來就有溝通上的困難，日語既然是當時的「國語」又是台灣各族人的共通語，各族溝通以日語為方便，流傳至今，就變成了一種日語客里謳 (詳參洪惟仁 (2010b))。這種客里謳產生於日治時代末期，因此在小川地圖 (1907, 【地圖 11】) 和小川、淺井地圖 (1935, 【地圖 14】) 找不到它的存在。⁸

2.3.3 方言混合

台灣的漢語，不論是閩南語或客語，乃至於華語都是方言的混合。台灣沒有任何一個漢語方言保存了原鄉純粹的方言。不過混合的程度是相對的，以閩南語和客語作比較，閩南語方言顯然比客語方言混合得更徹底，這一點可以從以下 3 個事實看出來：

⁸ 東賽德克 Tausa 方言就是 Toda (古音 Tauda) 早期遷到立霧溪上游支流陶賽溪，受到後到的 Truku 壓迫，北遷宜蘭，與泰雅族混居，後來和泰雅族 Sguliq, Ts'oli' 一起轉移講日語客里謳，Tausa 方言在宜蘭已經消失了。

- 1) 方言意識：一般的客家人有強烈的方言意識，台灣客語現存五大方言：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各說各話，各自認同自己的方言，對於不同的方言非常敏感。閩南語雖然有漳、泉兩種口音，但是除了一些老人，一般人很難說出漳泉之間的具體差異，甚至不能察覺對方的口音差異。因此現代臺灣閩南人一般很少有方言意識。
- 2) 方言歸屬感：大部分的客家人都知道自己的客家話屬於那個方言，對自己的方言有歸屬感。相對的，除了老一輩的閩南語使用者，或口音較重的鹿港人、宜蘭人，台灣閩南人一般說不出自己的方言是漳、是泉，當然在感情上也無所謂方言歸屬感。
- 3) 方言切換能力：很多客家人在家說的是一種方言，出門自動轉成當地的優勢方言。比如一位新竹六家的饒平人，在家裡說饒平話，出門說海陸話，碰到苗栗人可以改說四縣話，這是客語的「方言切換」(dialect switching)；至於碰到閩南人說閩南話，碰到外省人或在正式場合說華語那就更平常了，這是「語言轉換」(language switching)。相對的，閩南人的語言轉換能力比較差，閩南人雖然都會說華語，因為華語是標準語，但很少會說客語，至於能夠「方言切換」的人就更少了，一般的鹿港人或宜蘭人，不論到那裏都說自己的方言。

以上三個現象發生的原因是因為現代台灣閩南語只有偏漳、偏泉之分，方言差異不大；除了宜蘭人、鹿港人或澎湖人，很少人有方言意識，更少人有方言歸屬感；因為不管說什麼口音，都不妨礙溝通，所以也沒有「方言切換」的需要；又因為閩南語是台灣的自然共通語，一般台灣人都聽得懂，所以閩南語又稱為「台灣話」或「台語」，因此閩南族群除了遇到不會說台語的人，通常沒有「語言轉換」的需要。

回歸到方言分佈的話題。小川地圖 (1907) 於客語之下沒有再細分方言，但閩南語則分為漳州、泉州兩種。他對漳、泉之間的空間區劃，除了細節地方，大體上能夠反映方言分佈的實況，特別是在北閩州、中閩州、澎湖州。這一點比較小川地圖(【地圖 11】)、許世融沿草地圖 (2012, 【地圖 12】) 和洪惟仁地圖 (2013, 【地圖 13】) 即可印證。

問題出在南閩州。在小川地圖和許世融沿草地圖，台南以下各縣市漳、泉分界是很清楚的，洪惟仁的區劃地圖 (【地圖 13】) 在北閩州、中閩州和澎湖州漳泉方言也有清楚的區劃，但「南閩州」則標示為「混合腔閩南語區」。

「南閩州」所以標示為「混合腔閩南語區」是因為這個地方的閩南語方言已經混合得非常徹底，無法歸類為漳州腔或泉州腔。南閩州的閩南語雖然也有方言之別，如台南、

高雄的方言就不太一樣（如〈箱薑白〉韻類台南說-ionn，高雄說-iunn），台南南部的關廟方言也有「出歸時」特色（把普通腔的 tsh-說成 s-）。但這些是方言混合配方的差異，不是漳腔、泉腔的方言類別的差異，除了旗津、大林蒲、小港有一點偏泉腔色彩外，其他地區的方言很難歸為漳腔或泉腔，因此不得不另立一類「混合腔」來歸類。

小川地圖 (1907) 或沿革地圖 (2014) 反映的是一百年前的漳、泉分界，洪惟仁地圖 (2013) 把南閩州另立「混合腔」的分類與分區，反映了漳、泉方言融合的歷史演變。

3. 結論

本文以小川尚義的「臺灣言語分布圖」(1907) 為例，討論如何鑑別族群語言地圖文獻的歷史價值以作為重建台灣語言地理變遷史的一個方法。

日治時代的族群、語言研究，已經發表的地圖幾乎都是根據全面普查或者是全境掃描調查，非常具有史料價值，但這些文獻反映多少語言分佈的真實性，必須審慎評估、重新鑑定，才能還原百年來台灣的語言分佈史或族群分佈史。

本文根據許世融 (2011) 的考證認為小川地圖 (1907) 雖然名為「臺灣言語分布圖」，實際上只是祖籍分佈圖，其所根據的資料是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關於本島發達之沿革調查」的報告 (1901)。小川尚義把「沿革調查」(1901) 的祖籍分類直接等同於族群分類，並等同於語言分類，將祖籍地圖看成語言分佈圖其實是一種誤解。雖然後來小川尚義很快就弄清楚了，但這是以後的事了。⁹

本文 2.1 節以新屋鄉大牛稠粵漳腔閩南語被劃入客語區；二崙、崙背南部的詔安客語被劃入漳州語區，證明將祖籍地圖直接看成語言分佈圖的錯誤，並證明小川地圖 (1907) 是根據「沿革調查」(1901) 繪製的祖籍地圖。

2.2 節詳細比較小川地圖 (1907) 比許世融根據「沿革調查」(1901) 重新繪製的祖籍地圖 (2012)，發現前者比較粗略，推測其原因，除了手繪誤差的可能，也可能因為行政單位較大，模糊了小行政區的差異細節。

過濾掉這些錯誤，才能見證百年來台灣語言地盤真實的變遷。本文 2.3 節比較小川地圖 (1907) 與現代的分佈圖的差異舉出了台灣語言地理分佈變遷的三種情形：族群遷

⁹ 總督府 (1928) 載小川尚義所寫的序論〈漢民族移住の沿革〉已經指出汀州府雖屬於福建省其語系應屬於「廣東語族」，潮州府雖屬於廣東省，其語言應屬於「福建語族」。他所謂「廣東語族」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客語，而所謂「福建語族」即閩南語。

徙、語言轉移、方言融合。

本文提出重建語言地理史的方法論主張，認為只有釐清族群分類、語言分類和地圖技術上的誤差，正確重估文獻的價值，才能重建台灣真正的祖籍分佈、族群分佈與語言分佈的史實。

引用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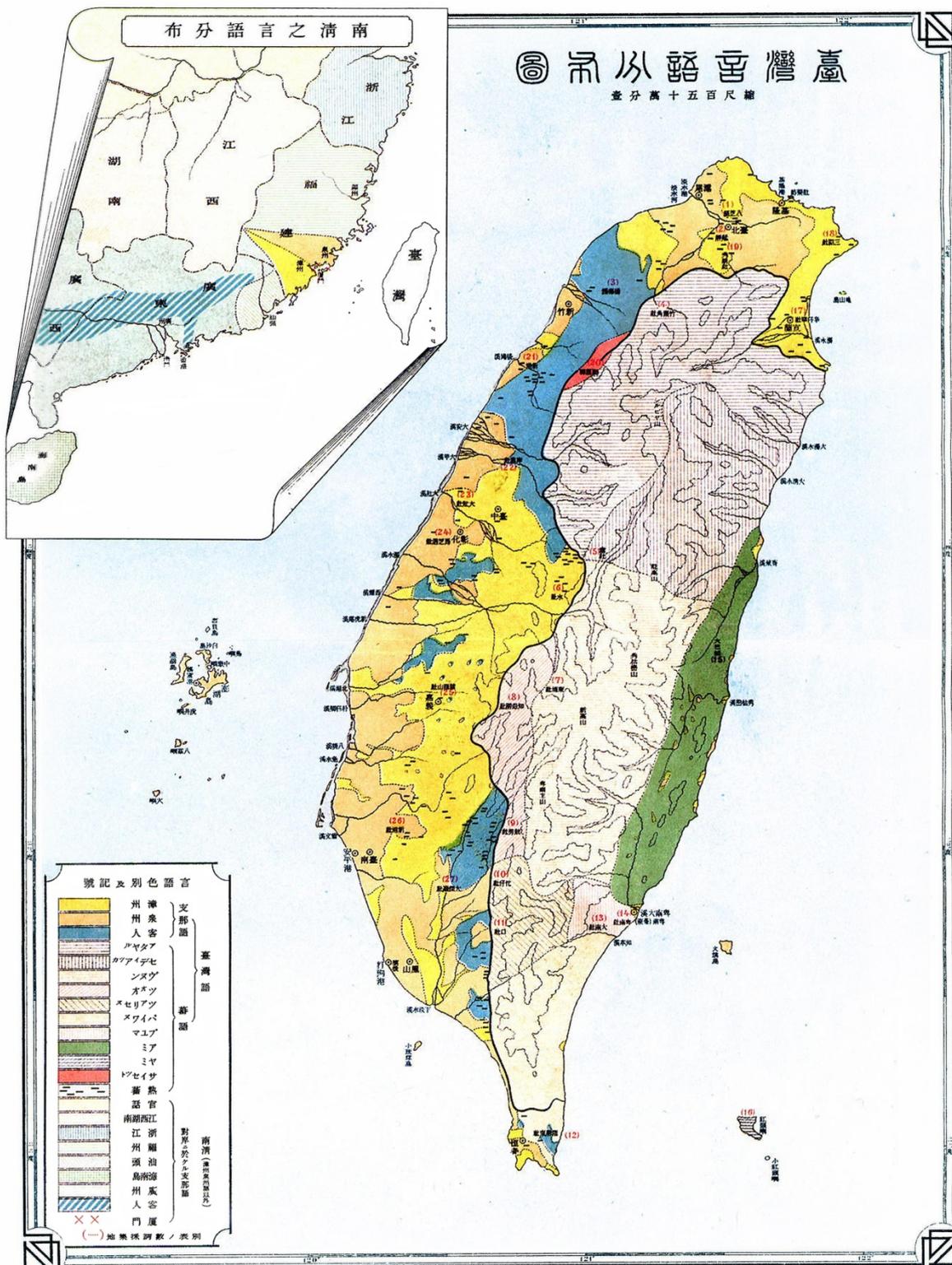
- 小川尚義主編. 1907.《日臺大辭典》，1-212。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總務局學務課發行。
-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 1935.《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說集》。東京：刀江書院。
- 吳中杰. 2010.〈大西螺地區閩、客語言與移民源流研究〉，語言與地理歷史跨領域研究工作坊論文，2010年6月25日。臺中：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 南澳鄉公所. 2002.《南澳鄉簡史》。宜蘭：南澳鄉公所。
- 洪惟仁. 2010.〈雲林縣的語言分佈〉，語言文化分佈與族群遷徙工作坊論文，2010年6月25日。臺中：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 _____. 1992.《台灣方言之旅》。台北：前衛出版社。
- _____. 2006.〈高屏地區的語言分佈〉，《語言暨語言學》7.2: 365-416。
- _____. 2010a.〈漳州詔安縣的語言分佈〉，《臺灣語文研究》5.1: 23-36。
- _____. 2010b.〈宜蘭的語言分佈與語言地盤的變遷〉，《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3.3: 1-42。
- _____. 2011.〈台灣西北海岸的語言分佈與閩客互動〉，《臺灣語文研究》6.2: 29-64。
- _____. 2013a.〈台灣的語種分佈與分區〉，《語言暨語言學》14.2: 313-367。
- _____. 2013b.〈閩南語方言的分化、競爭與融合：以入字頭（日母）為例〉，《臺灣語文研究》7.2: 1-33。
- 韋煙灶. 2010.〈雲林縣崙背地區族群語言分佈的空間關係之探討〉，語言與地理歷史跨領域研究工作坊論文，2010年6月25日。臺中：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 _____. 2013.〈詔安客家族群空間分佈的歷史地理詮釋〉，《中國地理學會會刊》50: 61-92。
- 真田信治、簡月真. 2008.〈台湾の日本語クレオール〉，《言語》37.6: 94-99。
- _____. 2009.〈再び台湾—日本語ベースのクレオール〉，真田信治編《越境した日本語—話者の「語り」から—》，98-116。東京：和泉書院。
- 涂文欽. 2011.〈彰化縣閩南語方言類型與方言分區〉，《臺灣語文研究》6.2: 111-145。

- 張屏生. 2007.《台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台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許世融. 2011.〈語言學與族群史的對話—以臺灣西北海岸為例〉，《臺灣語文研究》6.2: 65-95。
- _____. 2014.〈臺灣最早的漢人祖籍、族群分布—1901年「關於本島發達之沿革調查」統計資料的圖像化〉，《地理研究》59: 91-126。
- 陳淑娟. 2001.〈大牛欄方言的語音變化〉，2001年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論文，2001年7月2-3日。新竹：國立清華大學。
- _____. 2004.《桃園大牛欄方言的語音變化與語言轉移》。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研究室（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合著）。1935.《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共二冊）。東京：刀江書局出版（1996年由台北南天書局影印二刷）。
- 臺灣總督府總督官房調查課. 1928.《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台北：台灣時報發行所。
- 臺灣總督府. 軼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 7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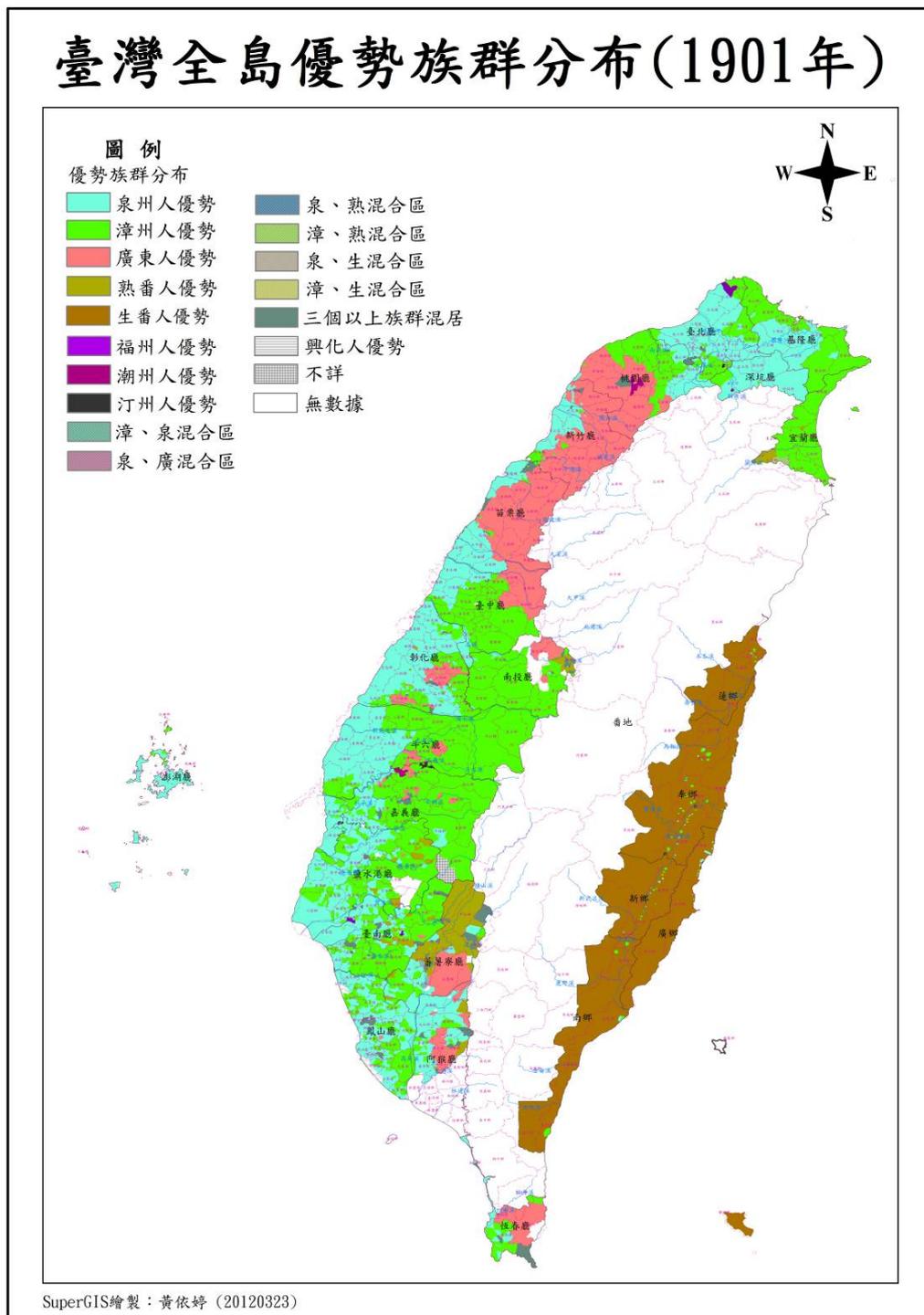
洪惟仁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uijinang@gmai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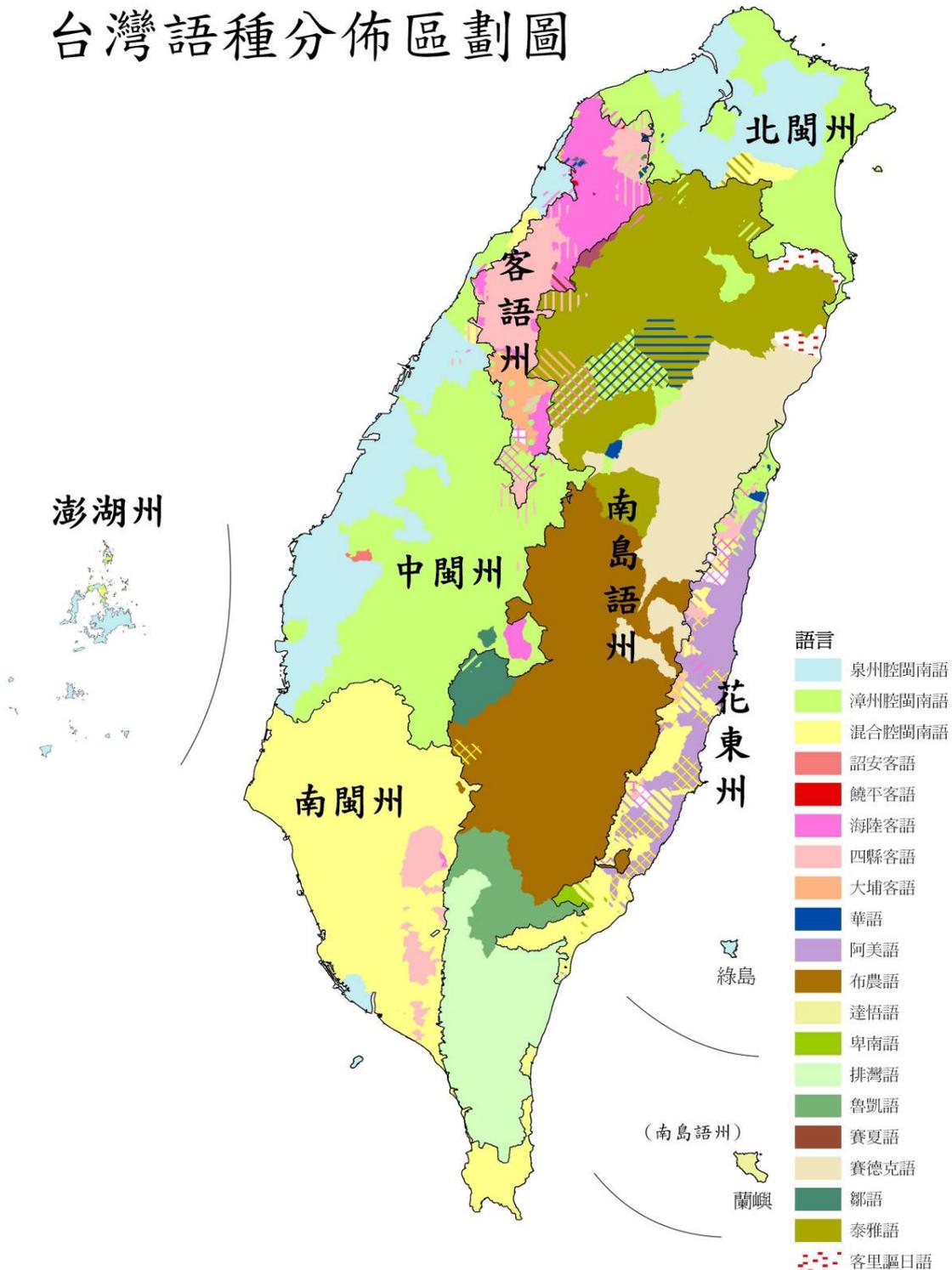
【地圖 11】小川尚義「臺灣言語分布圖」
資料來源：《日臺大辭典》(1907) 附錄



【地圖 12】台灣漢族祖籍及熟番分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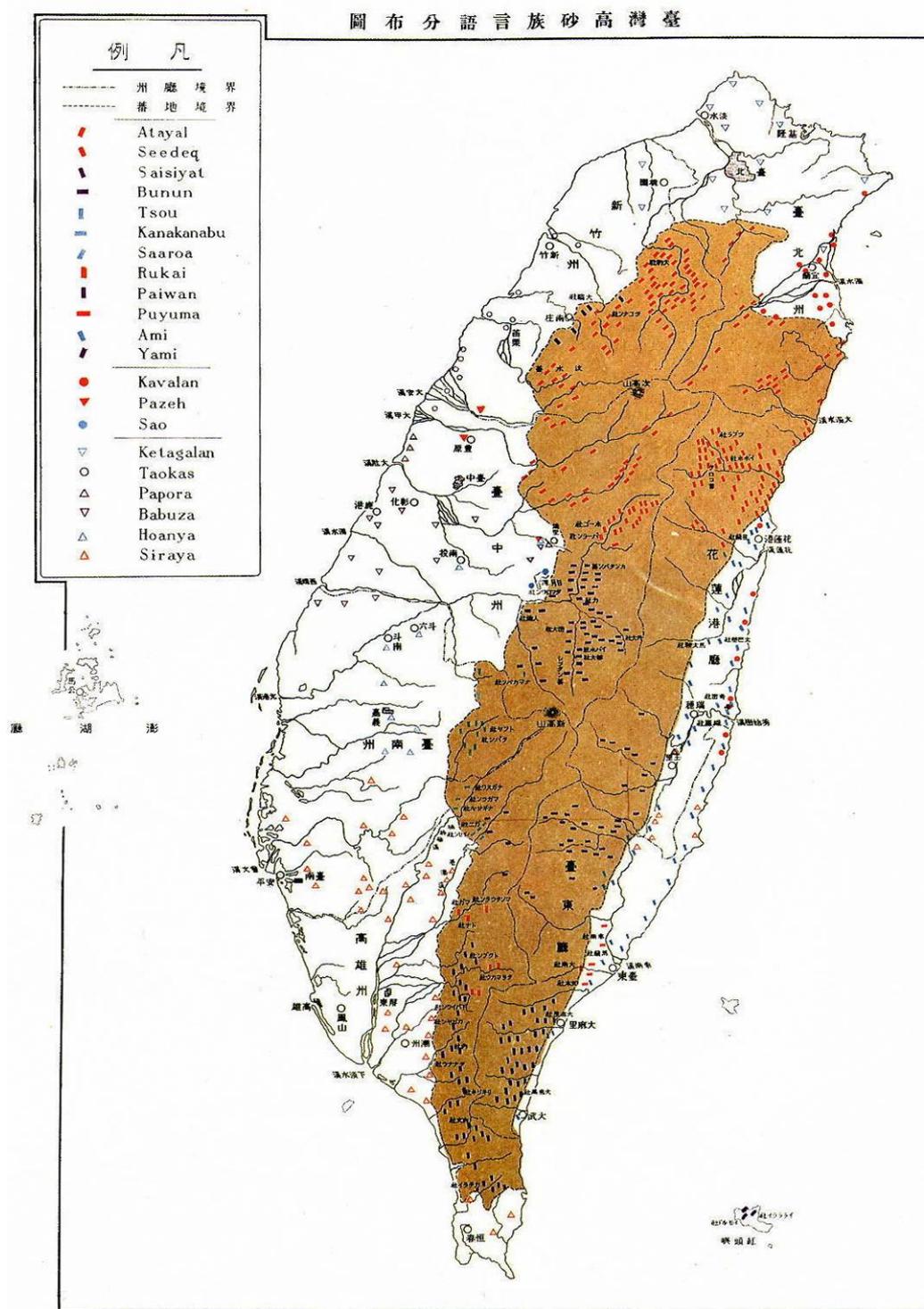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許世融根據台灣總督府「關於本島發達之沿革調查」(1901) 有關台灣漢族祖籍資料套疊今鄉鎮界所繪製，載許世融 (2014)

台灣語種分佈區劃圖



【地圖 13】台灣語種分佈區劃圖

資料來源：引自洪惟仁〈台灣的語種分佈與分區〉(2013)



【地圖 14】台灣高砂族言語分佈圖

資料來源：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説集》(1935) 附圖

The Historical Facts in the Racial Map and Linguistic Map:

On the Map by Ogawa (1907) and Others

ANG Uijin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mong various kinds of humanistic geographic maps, ancestral racial or homeland map is the most relevant and comparable with linguistic distribution map. If both of them were drawn with the same extent of accuracy and correctness, ancestral maps and linguistic distribution maps of different periods can serve as historical evidence for racial migration and linguistic transfer. But if either one has incorrect or inadequate data, its historical value has to be carefully evaluated. This paper sets out to talk on Naoyoshi Ogawa's *A Map of Linguistic Distribution of Taiwan* (1907), and then discuss the ways of appraising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racial or linguistic map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facts.

Key words: ancestral distribution map, linguistic distribution map, racial migration, linguistic transfer,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